

1

谈话，并非“谈话节目”的专利

“谈话”并不是一个新概念，但对“谈话节目”的界定，至今都难以有一个完整、权威的定论，即使是在专业的《广播电视辞典》中，这样一个已深入人心的概念也是难觅踪影。

如今很多人对“谈话节目”的理解更多地来自于一个外来语的“音译”，即 TALK SHOW，港台人将其直译作“脱口秀”，非常形象地概括了此类节目的特征：即兴谈论、脱口而出，特指广播电视中“以谈话为主”的节目，即“谈话节目”或“讨论节目”。

说到对“谈话节目”形态的认知，不少电视史专家都把 1954 年 9 月由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推出的一档新栏目《今夜》看作今天电视谈话节目之源。这档由喜剧演员斯蒂夫·阿伦担纲

主持的节目，有大量的现场观众参加，主持人以其特有的幽默感和敏锐的反应能力同嘉宾及观众进行着看似漫无目的的交谈，并不时地在轻松对话中创造出大批笑料，让观众们乐不可支，一时大受欢迎。后来这种节目形态便成为争相效仿的模本。

我国的电视谈话节目，最早可以追溯到 1995 年上海东方电视台创办的《东方直播室》，影响最大的则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于 1996 年开办的《实话实说》，其节目形式也是群体的现场交谈：通过主持人、嘉宾、观众共同参与直接对话，在轻松自然的气氛中，展开对社会生活或人生体验的某一话题的讨论，并通过叙述、讨论或辩论，达到各抒己见、增进交流和理解的目的。

所以，说到对“谈话节目”的认定和理解，在我的最初概念中是非常“明确”，甚至是“顽固”的：以“谈话”“讨论”为主要特征，还要有一些相对固定的元素：比如主持人，嘉宾，现场观众，有时也穿插乐队和音乐。

打破自己对“谈话节目”这种“固定认知”源于自己当年一篇研究“电视谈话节目”的硕士论文，而由此引发的对“谈话节目”界定的困惑和关注也使我完全改变了先前对“谈话”的理解。

我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那年，正赶上以《实话实说》为代表的电视谈话节目在全国异常火爆乃至遍地开花的时候，作为中央台一直具有锐意改革“实验”精神的新闻评论部属下栏目，《实话实说》不管是节目形态还是主持人的“表现”始终都有点像是评论部中的“另类”，加之当时电视谈话节目全国“克隆”之风渐盛，各地都出现了似曾相识的“实话实说”，不少学

者相继对此提出了质疑和担忧，所以，我决定将三年研究生学习的答卷——硕士论文锁定在对“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研究。

与此同时，我的一位同门师兄的研究课题则选择了对“中国电视访谈节目”的研究，在一次交流中，我发现对方参照的研究案例和模本很多竟然都是《实话实说》，便由此产生了疑问：访谈节目怎么能够把《实话实说》作为研究对象？访谈主要是一对一的专访，也可是一对二，甚至是一对三，但谈话节目却往往要有很多现场观众的共同参与，共同讨论；访谈以“访问”、一问一答作为获取和传播信息的主要手段，而谈话是以“彼此聊聊，互动沟通”来展开内容，所以，将《实话实说》引进“访谈节目”的研究中显然不具有“典型性”和“说服力”。

几天后，我们在课堂上共同观摩了《拉里·金》节目，这个被视作美国最著名的 Talkshow 节目，却是我先前认定的一对一的“电视专访”，于是我再次提出了自己对“谈话节目”的困惑。课堂上的争论从“访谈节目”和“谈话节目”的内涵扩展到了外延，一些人认为“访谈”顾名思义，有访有谈，所以本身就涵盖了“谈话”，那么像《实话实说》完全可以归属到“访谈节目”的研究范围内；另一些人的意见正好相反，在他们看来，“谈话”的外延更广，“谈话节目”中不管主持人对嘉宾，还是对观众，都可视作局域的“访谈”，而这样的“访谈”一旦脱离了大的“谈话”目标，也就失去了“访谈”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所以，“访谈”是辅助“谈话”的，也是“谈话节目”中不可或缺的环节和手段。因此，他们还建议我把像《东方之子》《中国报道》这样的“访谈节目”增加到“电视谈话节目”的研究对

象之中。

我最终没有采纳这个建议，而是有针对性地把自己对“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研究浓缩在了一个节目——《实话实说》。因为，这场争论反而使我更加“心虚”，毕竟，要作严谨的理论研究，尤其又是有说服力的实证性研究，基本概念的界定是不能回避的。而我自己对“中国电视谈话节目”的认定都是“模糊”的，又如何谈及举证、研究、说服他人？所以，我只能老老实实从一个我认为最具有代表性的节目入手，力求能“以小见大”。

2001年5月，即将开办的中央十套紧锣密鼓地准备上马一批新栏目，我因主持人大赛的机缘，幸运地有了种种新闻实践的机会。

凑巧的是，我先后主持实践的几档节目，恰恰都是当年我们论文争论中涉及的“谈话”与“访谈”节目的研究模本，而电视一线的亲身实践和各类节目的丰富积累也让我能够再次有机会反思曾经的困惑和争辩。

我第一个接触的栏目是《讲述》，接待我的是当时该栏目的制片人、《今日说法》的主持人肖晓琳。《讲述》是中央十套开播力推的一档讲述身边故事，展示真情实感的节目。从节目的形态设计上看，这应该属“访谈”节目：通过现场采访者和被采访者一对一的“访问”，引发出讲述人的最难忘和最珍贵的一段经历。

我“访问”的那期节目是“大舜号”海难中一段凄美感人的故事。当年“大舜号”由大连返航青岛，因途遇风暴，加之承载人数多，船体年久失修，所以，造成巨大伤亡，成为轰动一时的

新闻，而就在这次海难中，一位已知无法生还的年轻女子在船沉的那一瞬，打电话告诉她丈夫的却是让他娶另外一个女子为妻。我要面对的“访问对象”正是一年后已经与她的丈夫结合，并且身怀六甲的“另外一个女子”——凤。

这是一个非常适合“讲述”的故事，无论是事件本身的影响，情节的跌宕起伏，还是情感、人性的挖掘，都足以吸引人们的关注。编导讲完故事，我才知道我们要做的这期节目，其实是《讲述》的样片，虽说属开拓性的“实验片”，但也是决定栏目生存的“成败片”。

我既兴奋，又紧张，为能碰到这样的好选题，也为那份“成败”。

节目如期录制，演播室空间不大，现场制作元素也不复杂，两把椅子一张小桌，无论是灯光还是布景都非常符合沉浸其中、静静“讲述”的氛围，背景有时会有照片或者影像投影，主要用来辅助部分故事情节的讲述。

凤很亲切朴实，像很多乡村女子一样，害羞，不善言谈。我们是从海难讲起的，开场很顺利，凤的回忆和表达比我预想的要清晰、流畅，但很快，我发现“讲述”的节奏突然加快了，凤的情绪还没起来，可是故事已经进行了一半，我们预期的最应该“出彩”的“动情点”几乎是“悄无声息”地“滑过”了，最糟糕的是，明明凤是当事人，可为什么她的反应却像是在说别人的事，完全没有当事人的情感；明明所有的事都是凤亲历的，可为什么凤却说得僵硬、短促、毫无生气，完全不是我们私下沟通的那种连贯回忆和完整讲述的状态，这反而会让人对凤的“当事

者”身份和故事讲述的真实性产生怀疑。

我开始着急，急于要激发出那些“精彩点”，急于想控制故事的走向，也急于想掌握谈话的主动权，提问也随之越来越频繁，凤在我的“咄咄追问”下似乎更加茫然，“讲述”也更加规矩，直觉告诉我，这完全不是我想要的“讲述”的氛围，我和凤的感觉都越来越不对，但问题出在哪？

中场换带休息时，一直在旁督场的制片人肖晓林把我叫到了一旁：

“不要着急，试着与她‘聊’，不是让她‘答’问题，而是要让她能自然放松地‘讲’故事，说出那段经历，再现当时真实的场景，就好像我们每个人都在现场一样。”

这是我第一次切身感受和体会镜头前的“聊天讲话”，它和我先前作“焦点”记者时的“采访提问”明显不同，应该说是镜头前对话双方截然不同的两种“对谈”状态和叙述方式。

在新版的《现代汉语辞典》里“谈”的注解是“说”，是“互相对话，交流思想”，而要实现这种“对话”和“交流”，“谈话”更强调和看重的是“对谈”双方的一种互动状态，它不是简单的一问一答，而是相互交流、影响、启发、激励的互动关系，最终要引发出的是正常的话语状态和自然轻松的对话氛围。

尽管在形式上是一对一的“访谈”，但《讲述》追求的正是“谈话”双方的这种“互动状态”，尽管与其他类似的“访谈”或“专访”节目相比，《讲述》互动的目的既不是为了挑战和质疑对方，也不是单纯为了“激发情绪”，而是为了巩固讲述者独一无二的故事“主人公”地位，树立其主动讲述的信心，但无论

是哪一种形态，“采访者”都在做着相同的努力：营造出“正常谈话”的氛围。

对于“正常谈话”，《实话实说》的崔永元有自己的理解：“正常的谈话有很多种，我选择的是心平气和、和风细雨式的，虽然两个人的观点相反，但并不妨碍他们做朋友。我不希望在谈话现场有崇拜，我与嘉宾是完全平等的关系，正常的谈话要用平时习惯的语言说话，节目的策划设计也要符合正常谈话的逻辑、脉络。”

在这里，崔永元至少说明了实现“正常谈话”的两个重要因素：朋友般的对谈心态和习惯说话的叙述方式。

在实际的“对谈”中，心态往往决定了镜头前的状态。

“朋友般对谈心态”的确定不仅能够拉近彼此的距离，而且有利于双方主动进入一个正常、自然、放松的对谈状态，而要想在谈话现场迅速找到这种状态，使陌生的对谈双方瞬间产生有效、亲切的“互动”，需要“访问者”首先对自身的角色和叙述方式做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

在《讲述》中，“访问者”更多的时候只是一名“陪衬”。

《讲述》是一个讲故事的栏目，其中的很多内容更像一部纪录片，但它不是用画面和镜头，而只是用语言，单纯用当事人、用亲历亲为者的“故事讲述”传达出“记录”中的细腻与真实。所以，这样的内容定位和栏目表现方式，更加强调了“访问者”的“陪衬”角色，其主要任务就是映衬、配合讲述人重回过去的时空，重现当时的情境，用语言“回放”历史。所以，访问者应该既要有认真“听”故事的好奇和耐心，又要有引领受众适时变换听知

角度的意识和敏感。在这里，“访问”的重点不是为了展示“问者”的知晓，而是为了引发“说者”的谈兴；“访问”的目的不在“提问”，而在“倾听”，不难看出，一旦明确了自身的角色，“访问者”在对谈中的叙述方式也会有相应的转换，在《讲述》中，访问者的“问”不参有评，也尽量少用“激”，只需淡淡但适度地“转接导引”讲述者的话便足够，这实际上是在营造一种能与讲述者“正常、自然、放松”的话语状态相对等的叙述方式，即“谈”和“聊”。因为，这样的“访问”少了“问”的敏锐，但却增添了“谈”的自然和“聊”的平和。但无论是访问者的“听”或是“问”，还是双方的“谈”或是“说”，最终都是为了能烘托出故事的可靠性，能让讲述人完整投入地“讲”出故事。

在后来和凤的交谈中，我开始尝试着找寻我们私下朋友般的“聊天”感觉，并努力调整还原自己平常习惯的说话方式：放慢语速，不急着追问，直奔答案；控制自己，尽量耐心的多听；尽量抓住过程中的细节，让故事得以延续和伸展。即使凤哽咽地说不出话，我也给自己，给凤足够的时间保存和延续一种可贵的“讲述”情绪。

我发现，作为访问者，当你尝试着自己平时习惯的方式说话，当你用“认真倾听”来代替“咄咄追问”时，你实际上也在同时摸索和积累着镜头前的一种“谈话”心态：放下主持人、记者、问者的架子，以一个普通人的形象出现，随时关照“被访者”的情绪，以更加诚恳、平和的姿态，还对方以自然和轻松。

那次“大舜号”的“讲述”经历所引发的我对镜头前“谈话状态”、“谈话心态”的切身感受，以及由此“逼迫”自己在镜头前说话状态的逐步调整 and 改变，使我在后来谈话节目的主持

中受益匪浅。我因此也一直对《讲述》、对肖晓林充满了感激。

“谈话”是一种传播活动，一种传播关系，或者说是一种能够实现彼此交流思想信息的传播状态和传播方式，但当这种人际之间最普遍的信息传播及交流方式以节目的样式被放置、呈现在电视屏幕上，我们会发现，这种传播状态、传播关系连同其隐含的“对谈心态”和“话语状态”，其实并不只在“电视谈话节目”中才需要，在“访谈节目”中，甚至在对事件、对人物的“调查评论”“采访提问”中同样重要。

由此我再拐回头想想当年上学时的那场有关“电视访谈节目”和“电视谈话节目”的争论，反而会抛开概念本身，思考另外一个问题：“谈话节目”为什么难以界定？或许当时的我们都太拘泥于，或者过于看重“谈话”本身了，以一个并非“谈话节目”专有的特征来限定这个概念，只能是越来越困难了，这也让当初的我们走入了一个认识误区：过于纠缠在两类节目形态和表征的差异，而忽略了对电视谈话节目，对电视节目，进而对电视媒体信息传播的本体的关注和对其潜在的影响的判定。

在电视谈话节目中，“谈话”是一个特征，但更是表现电视媒体诸多“回归”的一种手段和元素。“谈话”在电视上的出现和“电视谈话节目”的深得民心，让我们看到了观众对电视本体的回归需求：包括屏幕上鲜活、自然、正常话语的回归；电视从业者真诚、平等、友善的心态回归；“受众本体”的回归，即“谈”受众关心的话题，“说”接近受众的话语；还有电视本质的回归，即用真切的话语，真挚的情感，真实的内容来展现电视“本真”的魅力。就这一点来看，“访谈”“谈话”“采访”“提

问”只是在用不同的表现表达手段，达到“殊途同归”的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谈话”并非“谈话节目”特有的专利。

作为媒体从业者，这种对于“谈话”非专利的认知更需要我们能随时地自省：“谈话”所蕴含的受众需求和本真回归在实际的“电视谈话节目”制作中是完善了，还是摒弃了？是有了更多的关照，还是熟视无睹？换句话说，当我们意识到，“谈话”并非“谈话节目”所独有时，我们是否也会想到“谈话节目”中的“谈话”有没有实现“谈话”本身的价值和意义？

《讲述》在创办两年后，不仅在十套连创收视高峰，而且还跻身一套播出，这在竞争激烈、淘汰严格的中央台实属不易，我想它的成功正是归于对故事、对人、对电视、抑或是对受众的“真”的挖掘和开发。

这既是电视从业者的职业责任和职业追求，也是电视有别于其他媒体的独特个性和本质属性，更同时体现了实践者和研究者的一种更成熟，更深入的节目认知和电视观念。

2

感知电视谈话的“真实”

实际上，就谈话节目的起源和盛行来说，广播谈话节目的影响要远远早于电视谈话节目。

据有关资料介绍，第一个广播谈话节目是美国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的 WBZ 广播电台在 1921 年播出的，谈话的内容是有关农业耕作的问题。早期的广播谈话节目大多只是由一个主持人（通常是某一方面问题的专家）侃侃而谈，自 30 年代起，嘉宾的介入和观众的参与才使得谈话节目的形式日趋丰富，后来有奖问答和音乐节目也常常穿插其中。二战结束前的无线电广播黄金时代，也是广播谈话节目的极盛时代，当时一个广播听众在一周中

能够选择的谈话节目多达 500 个以上。^①

此后过去了近十年，直到 30 年代末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 电视网才播出了象《芝加哥圆桌大学》和《美国城镇空中会议》这样典型的谈话节目。

而一向被视作开“电视谈话节目”之先河的 NBC 《今夜》节目的开办则是二十年之后的事了。

此外，就“谈话”本身的语言传播特点来看，“以声见长”的广播具备的传播优势和影响空间丝毫不比电视逊色，甚至不少人认为，“谈话节目”本应是广播之所长，电视搞谈话、讨论、对话，在视觉上肯定枯燥，不适合观看。就连最初中央电视台准备引进“谈话节目”时，也是顾虑重重：“电视节目中最令人讨厌的就是那些冗长的空话和套话，有图像的电视节目还不好看，更别说纯粹的谈话了？”^②

这让我们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偏偏却是电视媒介扩展了谈话节目的影响？相比于其他媒体，电视的魅力有哪些？与广播相比，谈话节目在电视中的优势是什么？该如何结合话语本身的特质和电视传播的特点来体现电视谈话的优势呢？

1999 年初，北师大艺术系承担了一项“电视栏目文化研究”课题，就中央台和北京台的一些重点栏目在北京地区进行了一次深度抽样调查。当问到“为什么喜欢《实话实说》”时，出乎调查者意料的是，谈论的话题并不是主要原因，人们最认同的理由

^① 见《谈话的力量——美国电视的晚间谈话与日间谈话节目》，苗棣著，刊十《现代传播》1998 年第 5 期。

^② 见《十年》191 页，孙玉胜著，三联书店。

是“真正做到了实话实说”，很多观众感兴趣的是话题的讨论过程以及谈话过程中传递出的信息和表现出的真情。这同时也诠释了电视谈话节目的最大特点：纪实感和真实性。

电视和其他传播媒介一样，有着传递信息、表达情感、反映思想等功能。但相对于书写文化的文字符号，影像是一个更善于呈现“真实”的符号体系。

电视谈话节目其实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单调、枯燥、缺少电视特点。借助屏幕，我们除了可以听到话语声音的感染力，还可以看到“谈话者”的服饰打扮、面相身势及其他体态语言，另外，演播室布景的独到设计、字幕、题花、音乐以及电视特技、网上信息的转接使用等等，都比广播谈话拥有更为丰富的符号资源和视觉冲击，不仅能为人物言谈增色添彩，而且也可以创造出电视谈话特有的“声画”效果。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电视媒介的另外一个突出特点还在于它消除了文字符号对大众的诸如时空、认知水平、文化语言差异等的限制。比如美国 CNN 对于“9.11”事件的报道，电视“现场直播”“实况转播”这种信息传播方式不仅使“地球村”每个角落的人都能够身临其境地同步感受到结局来临之前的悬念，而且还可随时随地亲眼目睹，亲耳相闻远距离正在发生的事件。

可以说，电视成就了人们的一种追求：对于“真实”的追求。

透过电视，人们不仅看见了犹如近在眼前的具体清晰、形象生动的自然景物和社会世事，而且还体验到了与现实时空同步进行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只有电视能够满足观众

的一份期待，并坚定地兑现着对受众的两个独有的承诺：

首先，人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未经修饰——准确地说来说是来不及修饰——的“真实”。正是这种“过程的真实”牵引着人们的好奇，满足着人们的探究，也同时展示着电视媒介本身的一种魅力：对“真实”的记录，尤其是对现实生活中即逝的“真实瞬间”的留存、复制和传播。

其次，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到这种“看到的真实”中，并体验到“交流”的愉悦，从而产生和获得“真实感”。

这不禁让我想到与一个孩子的对话。

当问到电视和电影的区别时，孩子的答案是：电影里的人互相说话，电视里的人与我们说话。

传播学的创始人施拉姆曾强调在大众传播中最有效的传播方式是面对面的 interpersonal 传播，而在所有的大众传播媒介中，只有电视可实现“面对面”的人际传播、人际对话。

电视的家庭播看方式和它“真实”的传播属性，不仅使面对面地谈话交流，观众参与的问题讨论、名人访谈这些看似枯燥的表现形态有了更合适的接受氛围和实现条件，而且它所能体现的人际传播的完整性，以及由此带来的参与感、认同感和真实感，也绝不是不见面的广播和同样具有形、声、色、情、意特点的电影所能替代的。

孩子纯真的直觉所感知到的“与电视里的人说话”，正说明了这一点。

而在电视众多的节目类型中，“电视谈话节目”以其鲜明的人际传播特性不仅极大地满足了人们平等交流的心理愿望，增强

了参与性，而且也极大地丰富和延展了电视带给人们的“真实感”。

“真实性”和“真实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其实，对“真实感”的理解并不复杂：即人们对于真实与否的即席判断。

但在具体的电视谈话节目的制作过程中，“真实感”往往会遭遇这样的困惑和尴尬：明明屏幕上呈现得是真实的谈话现场，也有目击人真实的声音，可为什么电视“真实”的魅力反而丢失了。

就像当初我在《讲述》栏目中所遭遇的困惑：我明知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明知坐在我面前的讲述人就是真实事件的目击人和见证者，为什么对方却像是在转述他人的事？为什么我感觉不到预期的真实的情感流露？而当我作为采访者有这样的困惑时，我相信我的观众也在提出他们的质疑：这事是真的吗？这讲故事的人的话可信吗？如果不是事先故意安排好的，为什么说话和背稿一样？为什么没有应有的反应和情绪？

我后来在反思这期节目时，也在想这样一个问题：都说“眼见为实”。为什么我们看到的“真实”在实际中却感觉不到。

众所周知，感觉——包括视觉、听觉、触觉、嗅觉——是鉴定真实与否的主要依据。对于电子传播媒介来说，不计其数的眼睛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所以，我才会常听到人们用“注意力经济”“眼球经济”来比喻电视的经营与繁荣。所以，当“看”的消费支持了电视的发展与繁荣时，我们很多时候会过于看重“视觉”的真实，而忽略了“听觉”的真实。

于是，在“谈话节目”中，原本应有的对“语言”规律本身的尊重，尤其是口头语言所传达的真实的内容，以及所蕴含的真情实感和真实的语境却往往因照顾节目的“可视性”而被置若罔闻。

2001年，我有机会采访到了作家刘震云，那是一次并不愉快的采访，但对于我如何来认识电视谈话的“真实”却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刘震云是我喜爱的作家，在采访他之前，我还曾在北京广播学院听过他的讲座，他那种朴实的机敏、不动声色的睿智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样的人很适合做谈话嘉宾。

我们提前在中央台旁的梅地亚宾馆见面，那也是我做谈话节目以来第一次与嘉宾提前沟通，在此之前，为了能保持谈话双方的好奇，也为了使演播室现场的对谈尽可能地留有新鲜，作为主持人的我一直避开与嘉宾的提前沟通。这次却是嘉宾刘震云主动提出想见主持人，当然，我也希望能趁此机会增加更多对谈话有利的信息。

为了表示我们有备而来，我和编导特别拟定了详细的节目提纲，还列出了重点问题，万万没想到的是，偏偏是这煞费苦心的“准备”却让刘震云颇为“不屑”。

眼前的刘震云有着和他的文章一样的朴素：布衣、布鞋、布包。我们闲聊不久，很快把话题转向了节目，刘震云谦和地先问：你们想让我说什么？

因为刚巧赶上他的首部长篇《故乡、面和花朵》问世，他又是栏目请到的第一位作家，所以，结合刘震云本人的经历和谈话想传达的“人生启迪”这样的主题，我们希望能以新书为谈话由

头，按着出书、写书—创作、生活—成长、人生这样基本的谈话脉络来谈。我和编导把拟好的思路和采访提纲大致说了一遍，刘震云非常认真地听完后，却摇了摇头：

“这样谈话不好！”

我和编导很诧异：“哪点不好？”

“上次录小崔的节目，人家就让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没有任何提纲吗！”

在这次见刘震云前，我甚至还会预想要“探听套取”一些有关作家的独家“悬念”和“趣事”，但实际上，这次沟通我没有从刘震云那里获得任何对“谈话”本身有助的信息，但通过这种近乎“跑题”式的闲聊，我却收获了有助于主持人现场把控谈话内容的诸多“边缘信息”：包括刘震云的喜好需求、他的说话风格、与人的交流习惯，表达的状态方式等等。这次沟通后，我们和作家还达成了一种默契：就按刘震云的想法去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再受提纲限制。

但在当时，这样的默契，或者说这样的“承诺”主要是为了“能请到嘉宾”的“权宜之计”，是出于对谈话嘉宾礼节上的尊重，我们那时还根本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尊重对于后来鼓励现场“真实”的谈话，对于引导嘉宾呈现精彩话语的巨大功效。

作为这期谈话节目的主持人，我在当时仍固守着一个惯有的节目流程：嘉宾讲述一段后，中间穿插部分观众的提问，为了能让谈话“好看”，除了场上场下的“问答互动”外，最好能发现观众中的一些“冲突性”“尖锐性”的问题并加以引导，借此既可防止嘉宾一边说的单调场景，也可通过“冲突”和“争辩”来